

爱我中华

第二辑

文史资料专辑

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编

爱我中華

文史资料专辑

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编

1986. 10. 30

目 录

我和孙中山先生八次会见的回忆……………喻育之（1）

高瞻远瞩 革命先行

——回忆聆听孙中山先生的几次演讲……………何元恺（15）

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中我的回忆……………李任夫（20）

孙中山先生与海军……………陈务笃（32）

忆述湖北陆军测绘学堂……………喻育之（39）

辛亥革命时的海军……………陈务笃（44）

怀念故友罗良斌同志……………程一新（50）

我参加第六军在北伐战争中的战斗经过……………何元恺（55）

在北伐进军中……………苏文钦（72）

回忆我在北伐战争中的战斗历程……………慕中岳（80）

东征战役亲历记……………何元恺（93）

戎马生涯另忆……………詹龙光（102）

我入黄埔军校的经过.....巫剑峰 (127)

北伐时期前后的另星回忆.....傅光培 (129)

北伐时期的点滴见闻.....曹美成 (132)

北伐军攻克武昌城的见闻.....胡起祥 (139)

北伐时期孝感劳动童子团的活动.....汪正本 (148)

西安事变中李济深的态度和活动.....李任夫 (155)

西安事变话统一.....李世鹏 (162)

西安事变的回忆.....苏文钦 (169)

西安事变备战之行.....杨德修 (184)

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陈伯鹏 (187)

缅怀爱国志士杨虎城将军.....李春初 (191)

西安事变侧记二三事.....汪正本 (202)

(08) 三言言.....查平崇儒军部非断野

(小资料: 袁部.....辛新前和余革交辛

(孙中山先生事略.....吉同魁身零克郑念君

辛亥革命

(66) 孙文付.....查平崇儒军部非断野

北伐战争

(67) 孙文恭.....中军部非断野

西安事变

(08) 孙中恭.....查平崇儒军部非断野

(66) 孙文付.....查平崇儒军部非断野

(601) 孙文恭.....查平崇儒军部非断野

我和孙中山先生八次会见的回忆

喻育之

当我正在欢度九十八岁幸福生活的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我怀着极为崇敬和缅怀的心情，纪念我们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的诞辰，更为我们中华民族在历史舞台上有过这位巨人而感到骄傲。我们革命党人在他的领导下，把清王朝统治二百六十七年的最后一个皇帝拉下马来，结束了二千几百年封建统治的政治局面，建立了中华民国。继而，孙中山先生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团结国内一切革命力量，向帝国主义及军阀势力进行不懈地斗争，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他的丰功伟绩是永垂青史的。

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先生还是青年时，看到清朝政府大搞洋务运动，妄图以坚甲利兵来维持清王朝的统治。孙先生认为这不是我们中国的富国图强之道，曾向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书，力陈时弊。他认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

其用，货畅其流。”他说：“此四者，富国之大径，治国之大本也。”他初期的这些革命思想，对我以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影响是很大的。

孙先生于一八九四年，在《兴中会章程》中大声疾呼：“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孙先生这时提出的革命主张，在于唤醒人民群众的觉醒。当时我们读了他的言论，深深地体会到清廷的政治腐败，已濒于边缘，不可救药；辱国丧师之事，层出不穷，生灵涂炭，啼饥号寒，比比皆是。感于时势，有志青年都应抱有：“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华夏”之愿。

一九〇五年八月，中山先生创建同盟会于日本，他在《同盟会章程》中，明确地提出中华民国军政府之宗旨和条理的四大革命纲领，及三个步骤公布于国民。四大纲领者即：一、驱除鞑虏；二、恢复中华；三、建立民国；四、平均地权。对于以上四大纲领的实施程序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军法之治；第二期为约法之治；第三期为宪法之治。我以后即以实现孙先生所提出的这一革命目标为职志，为“复四千年之祖国，谋四万万人民”而奋斗。

之福祉”而奋斗。

我从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到我参加辛亥革命斗争，中间虽然有一段较长的时间，从事于颠覆清廷、恢复中华和反抗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和革命工作；但是，我和孙中山先生会面，还是我从日本回国以后的事。回忆我参加辛亥革命以后到孙先生北上去世的十四年中，先后和孙中山先生见面共有八次。有的是聆听他的教诲，有的是向他请示革命工作。对于他的谆谆教导，在我的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十年来，每当我回忆那些难忘的岁月，思想为之开阔，精神为之振奋。孙先生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眼前。

我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是在一九一二年四月（即辛亥革命第二年），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以后，应副总统兼湖北省都督黎元洪的邀请，从上海来到武汉的时候。陪同孙中山先生来鄂的胡汉民说：“中山先生这次来鄂有三大感情；一是调查战迹，凭吊忠魂；二是伤痛瓦砾，督促建筑；三是哀思流离，抚恤疮痍。”这次孙先生在武汉逗留了五天，曾向湖北省民众团体演讲多次，阐述革命的道理。孙先生到武汉的第二天（四月十日），在武昌黄土坡外语专科学校召见参加武昌辛亥首义的几十位同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先生着长袍

马褂，神采奕奕，对在座的辛亥首义同志进行了大约三小时的教诲。对参加首义的同志，倍加赞扬，并说：“民国成立，咸感幸福，推本溯源，都是在座同志们首先光复武汉的功劳。”先生讲述了革命形势，赞扬了首义同志对革命的贡献而外，还针对我们一部分革命同志不同意他辞去临时大总统的不安情绪，作了说明。他说：“当前有很多人对我了解，以为我功成身退；实则革命尚未成功，仍须继续努力，而我之所以辞职，乃由形势所迫。方今南北尚未统一，战祸难免，为了避免流血，结束战争，借用袁世凯的力量推翻清廷，则贤于用兵十万，因而采纳众议推荐袁世凯任总统职务；而我则想和同志们一道为社会建设，找出一个统一改进的办法。”先生谈他对于功名利禄的看法，说到：“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居”的这两句话时，我们大家报之以热烈的掌声，钦佩中山先生不为自己名利的崇高品德。同来的章太炎先生禁不住用双手拍着大腿叫好。我面聆中山先生的讲话以后，对先生忠诚谋国、大公无私、献身革命的精神，表示由衷的敬仰。

一九一七年的武汉，已为军阀所盘踞，我仍在封建势力下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但事为武汉军阀头子王占元获悉，下令通缉捉拿我，派人到汉口四官

殿德兴衣庄找我大哥喻俊卿，要他将我交出。我不得已乃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此校为孙中山先生和日本犬养毅所合办，中国前往留学的学生很多。不久我被留日学生推选为留日学生会理事，但为反对“中日防共协定”，又为日本当局所不容。一九一八年，我从日本留学回国，在上海联络留日同学王兆荣（他是四川人，公费留学生，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曾琦、温立等人组织“中国留学生救国团”，王兆荣任团长，我任副团长。同时创办《救国日报》以传播革命理论，从事反帝、反军阀的活动。由王兆荣任报社社长，我任副社长，曾琦和温立先后任总编辑。此时留日学生被迫回国的很多，都住在上海，我们以“留日学生救国团”的名义向各界呼吁捐款资助，以维持留日学生的生活及报社经费，除一部分靠资助外，其余则自给自足。我们劝捐的对象很广，除爱国人士外，有钱的商人甚至当时的政府官员我们都去找过。经过我们宣传爱国意义而慷慨解囊的人很多，其中对我们资助最多的人是江苏南通的爱国实业家张季直先生。他引我去看过他家的房子，他说：“我这房子的建筑材料都是国货，连用的钉子都是国产品。”可见他不用洋货的爱国热忱。《救国日报》开始是用油印，后来购买机器印发，先后出版有二十七个月，

约八百余期。销售最多的是南洋印度尼西亚各地，其次为武汉。武汉销售《救国日报》是几个人抬一个架子，在街上游动出售，别具一格，每天报纸都被抢购一空。我常用阮恒清的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阮”是我母亲的姓，“恒”是“恨”的谐音，取其痛恨清廷之意。应城蒋作宾先生送给我一本千分之一的《地图册》，我写文章或报导消息时，连一个小地名都可以查出来，因而能引人注目。报社的社址是租用上海法租界的房屋，本来是想利用法国人的势力作掩护的，但由于我们革命的目标是反帝、反军阀，所以对于法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也应作谴责。有一次《救国日报》登载了法国虐待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华工的消息，遭到法租界当局的嫉恨，逮捕了总编辑温立，并声言要罚款和封闭报馆来威胁我们。我立即赶往环龙路44号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去向孙中山先生汇报情况。这时孙先生正在上海闭门著书，“以学识唤醒社会”，“以主义普及国民”。撰写《孙文学说》及《实业计划》，以七事为证说明“知难行易”的道理。先生博学多闻，手不释卷，在接见我们时也是一面看书，一面和我们谈话。当他听到法国人逮捕了我们的总编辑，要封闭我们报馆时很气愤地说：“你们办《救国日报》，为的是救国，救国就

要有勇气，就是杀头也不怕。”我再将报社困难情形向他汇报，意思是说我们无款可罚。先生随即给我三百块钱，嘱咐我：“准备他们罚款。”接着对我说：“我在这里，没有什么可怕的，总编辑马上就会释放出来的。”第二天温立总编辑果然回来了。以后，中山先生又有几次派人送钱来支持我们继续办《救国日报》。这是我第二次见到孙中山先生。

我第三次会见孙中山先生是在一九一九年，还是在上海办《救国日报》的时候。《救国日报》的经费来源，一部分是靠登广告收费。我们在报纸的中缝位置，刊登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广告，有人说该公司老板简昭南兄弟已经加入日本国籍，该公司生产的香烟是日本货，我们《救国日报》为日本人推销仇货，这是个原则性的错误。事先因为不知道，故有此失，经过了解后，此事属实，我们当即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广告撤版，并在原处换上“痛语”二字，表示我们对此事的沉痛忏悔。简昭南兄弟见报后，大为惊诧，想用金钱来收买我们，他愿意出二十万元的代价，要我们仍换上他的广告。当时报社内议论纷纷，意见不一，曾琦等竟然主张将钱收下再说，我坚持不能受贿，坚决不收他的钱，坚决不登他的广告。简昭南兄弟用利诱的办

法不能得逞，转而采用威胁的手段来打击我们。他们兄弟请出一名当时国会议员、上海有名的律师某人（姓名记不起），出面来对我们进行威胁，强迫我们刊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广告。我为此事，特地去投诉中山先生。先生听后，一面痛斥那个律师的无耻，一面勉励我们坚持“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真理。事后知道，那个大律师受到中山先生的严厉批评，再也不敢来过问此事了。这次我见到中山先生时，有一位女士坐在孙先生对面，我走出来后问接待我们的负责人，他告诉我说：“那位就是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宋庆龄女士。”

这次会见孙中山先生，我还清楚地记得中山先生住的那间房子粉刷的油漆还没有干，我走出时衣服上擦了一点油漆，事后我还说，把这件衣服保存着，留作纪念的。今天追忆点滴琐事，足见我对当时与孙中山先生的会见，印象是何等深刻。

一九一九年，是我国划时代的“五四”运动开始的一年。同时也是孙中山先生为国民革命作出最大决策的一年。这一年的五月，孙中山先生撰写的《孙文学说》又名《心理建设》定稿付印。同时发表《护法宣言》，认为“今日之和平救国之法，惟有恢复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之一途。”十月，

在上海举行的武昌起义八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改造中国的第一步方法：“只有革命。”同时将一九一四年建立的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设总理一人总揽党务，下设总务、党务、财政三部，分别由居正、谢持、廖仲恺担任主任。这时，我以全国学生联合会理事长的身份，偕同上海的一批学生、工人、商人代表、华工代表去见孙中山先生，向他表达了我们对他无比的崇敬和坚持革命的决心。中山先生当即以“言必信，行必果”的格言教导我们，大家深受启发。这是我第四次见到孙中山先生。

我第五次会见孙中山先生是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孙中山先生被迫离开广东，避赴上海的时候。在这以前，上海留日学生救国团等七个团体联合通电，痛斥徐世昌恢复帝制、内乱、僭窃等罪，历举应推倒之理由八条，全国各界通电广州政府，请求北伐。孙中山先生以海陆军大元帅名义，下令北伐。不料陈炯明部四千余人围攻总统府，并炮击孙中山先生住所粤秀楼，孙中山先生仓促脱险，乘“永丰”舰转移，与叛军鏖战五十余日。后因叛军得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支持，北伐军撤退至湖南、江西，孙中山先生亦离广州赴上海。

迨后，孙中山先生发动讨伐陈炯明叛军，于一九二三年初，平息了叛乱后，革命军誓师北伐。其时，我的湖北同乡何成浚在福建任北伐军师长，邀我去任该师军法处长。我著有《军人之友》一书，在北伐军中作为士兵训练教材，曾广为传播。后来，我因不习惯于部队生活，由福建泉州仍到上海搞革命活动。这时，中山先生为了发展革命武装力量，派我的黄陂同乡潘正道去四川策动刘湘出师北伐，刘湘即任潘正道为师长。我去见孙中山先生时，中山先生任命潘正道为鄂西革命军总司令，要我担任潘正道的驻沪联络员，并将给潘正道的手令要我去转交，还要我口头对潘正道说：“鄂西总司令，并不限于鄂西，可向川东一带伸展，策动川军出师，配合北伐。”同我一道去重庆的有：潘汉臣、王季侯、李华三和董必武同志的弟弟（名字忘记）；另一方面由董必武同志联系派去四川的共产党员杨经曲（武昌人）等，也是到四川做策动刘湘出师北伐的工作。我们国民党这一班人到重庆后创办了《重庆时报》，由我负责，旨在宣传革命，唤醒群众；共产党人创办了个《新蜀报》，由肖楚女负责。我在《重庆时报》出版时写的第一篇社论，就是以“鼓吹北伐，不涉党争”为题，表示愿与共产党合作。

我第六次会见孙中山先生主要是介绍施洋参加国民党。一九二二年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成立，聘请施洋为法律顾问，该会拥有武汉工团联合的二十八个工会，声势浩大。施洋为维护工人利益曾与湖北的军阀作过尖锐斗争。在这以前，全国各界联合会在武汉开会时，由施洋担任大会主席，决议将张敬尧祸湘、陈树藩祸陕、倪嗣冲祸皖的种种罪行通告全国，一致声讨。因而施洋的声誉遍及全国，成为著名的律师。孙中山先生早有所闻，而施洋对孙中山先生也很仰慕。那年施洋到上海参加全国法学会议，住在我家里，经常和我谈论国家大事，表示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仰，意欲一见孙中山先生。有一天我陪他一同去见孙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对施洋在汉口支持工人群众的革命行动，倍加称赞。认为他有胆有识，在革命阵营中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当时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意见，经李大钊与孙中山先生谈判，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确立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孙中山先生主盟，李大钊，陈独秀、张太雷、蔡和森等参加了国民党。那时我还不知道施洋究竟是否共产党员，我想即使他是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也是可以的。因而向中山先生提

出介绍施洋参加国民党的意见，先生欣然同意，施洋当面宣誓，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不幸的是第二年施洋在“二·七”大罢工的斗争中，牺牲在军阀的屠刀之下，当他的遗体安葬于洪山之麓的时候，我为他书写“施洋烈士之墓”的碑文，以志我的哀思。

我第七次和孙中山先生见面是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在北京召开政治军事会议，决定电请中山先生北上，商讨和主持时局问题。孙中山先生决定北上前，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谭延闿负责大本营事务，驻守韶关，主持北伐军事。孙中山先生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政治主张，要求“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孙中山先生偕夫人宋庆龄离粤北上，抵达上海时，受到万余群众的欢迎。这时已传闻孙中山先生患有肝病，我立即赶到上海，去晋见孙中山先生，劝先生以健康为重，暂缓此行；先生对我讲了革命的有利形势后，语重心长地说：“为了国家的和平统一，革命党人是从不考虑个人安危的。”显然，我们的劝阻没有发生作用，反为先生的教诲所说服。

第八次会见孙中山先生，也是我最后一次会见中山先生，是在第七次会见先生以后不久。我又和

当时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几位同志去劝说先生缓期北上，孙先生除了叫我们不要为他的健康担心而外，还告诫我们说：“国家一天不统一，革命就不算成功。”同时谈到段琪瑞邀请国民党参加他筹备召开的所谓“善后会议”，实质上是个帝制复辟的会议，国民党人决不参加他的这个会议。我们是针锋相对地坚持召开国民会议，商讨南北和平统一的办法。他说：“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中国要统一，非首先废除不平等条约不可。”后来，孙先生仍然为国是奔走，不顾安危，毅然北上了。抵达天津时肝病发作，仍然扶病入京，受到北京十万人的热烈欢迎。孙中山先生在车站发表书面谈话，指出：“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已被清朝政府从不平等条约里卖与各国了，以致我们仍然处于殖民地的地位，所以我们必须救国，要救国就要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先生在弥留之际的《遗嘱》里提到的：“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其为国家的和平统一与独立自强的救国精神，实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回忆我八次面聆孙中山先生教诲的情景，先生的伟大形象仿佛就在眼前。先生的一切至理名言，更是令人终生难忘；而先生没有完成的遗愿，